

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宝军¹, 王 博², 罗剑朝¹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2. 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研究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972 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作用和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均发挥积极作用;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发挥了调节效应,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越强。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民幸福感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幸福感状态;幸福感指数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2)12-0165-11

Influence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Gansu and Ningxia

LI Baojun¹, WANG Bo², LUO Jianchao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o promote farmers' sense of well-being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on farmers' multi-level well-being and using 972 micro-social survey data in Gansu and Ningxia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s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status and multi-level happiness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play an active role i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The factors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multi-level happiness index of farmers. This paper further confirms that political trust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affecting the multi-level happiness of farmers, the higher level of farmers' political trust is, the stronger the multi-level

收稿日期:2022-07-26 修回日期:2022-10-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105,7187310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452022074);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软科学课题(rkx20221801);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2021YB012);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561221003)。

作者简介:李宝军(1988—),男,甘肃环县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管理。通信作者:罗剑朝。

happiness of farmers will be brought by soci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to provide new ideas.

Key words: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political trust; state of happiness; happiness index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全面胜利,政府扶贫工作的重点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缓解相对贫困,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1]。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不断提高农民群体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如何提升中国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就成为了政府部门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追求目标。基于该目标,政府部门积极推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消除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合理现象,这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导向的转变是政府利用公共政策提高全体农民生活水平最直接的表现^[2]。然而,政策是否为社会成员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才是检验公共政策实施效果最为根本的标准,所以农民幸福感是检验或评价政府社会经济发展及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相关政策实施效果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一、相关文献综述

影响社会个体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经济、健康、生活、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因此关于社会个体幸福感的研究是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共同话题。

国外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文献很多,主要集中在幸福感的种类、影响因素、测量方法等方面。如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将幸福分为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追溯了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享乐主义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客观幸福理论,强调价值实现^[3]。此后,国外学者对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包括从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构建幸福感测量指标,同时从年龄、婚姻、财富、人格等人口学因素和遗传、家庭环境、生活事件、文化、经济和社会支持等社会因素视角探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4]。此外,还结合人们的城乡、代际等结构特征,从教育水平、医疗保

险、体质健康状况等具体机制来研究社会成员的幸福感^[5]。国内对幸福感的已有研究主要是以农民中的小众群体为研究对象,造成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如陈前恒等^[6]对教育可及性与贫困农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刘同山^[7]对参与农业合作社农民的幸福感知研究。在研究视角方面主要以纯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主,缺乏对农民幸福感问题多学科交叉研究,如许海平等^[8]对绝对收入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乐君杰等^[9]对宗教信仰与农民幸福感的研究。在农民幸福感测度方法方面主要以调查问卷形式的单一主观判断指标为主,忽视了幸福感的多层次性,如张彤进等^[10]基于 CGSS 数据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定量研究,尤亮等^[11]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

研究。在政府主导的农村发展进程中,农民整体生活水平和需求层次逐渐提高,使得厘清社会保障、政治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基于该研究主题,本文利用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972 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从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方面探讨了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机理,以丰富现有关于农民幸福感的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研究假说与理论模型构建

(一) 研究假说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反映的是农民通过环境或者物质资源提升社会参与的程度,是农民的现实生活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组织系统为农民提供的生活安全保护,使其在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时仍然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参与社会的机会^[12],这显然是有利于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提升的。具体来说,收入保障是农民生活的基础,农民家庭收入和个人收支状况越好,则其子女教育、医疗和赡养老人的费用负担就会越小,农民的幸福程度也

越强^[13];住房保障反映的是农民是否具有良好的住房条件,在我国农民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的现实情况下,住房问题不仅意味着农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而且还是农民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标志,直接影响着农民对生活的满足程度^[14];健康保障反映的是农民获取健康资源的机会,享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具有明显的优越感,相较于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而言,其对自身的生活状况也较满意^[15];就业保障是农民生活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稳定的就业不仅能够为农民提供生活所需,还能带来更丰富的精神满足和心理归属感^[16];环境保障反映的是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安全情况,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各种污染日益严重,暴力犯罪不断增加,这些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都会影响农民对生活的体验满意程度^[17]。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等政治系统抱有的信念或信心,是社会公众政治心态、情感等心理因素的综合^[18]。公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支持政府,公众就越有可能遵循和执行政府推行的政策,政治体系也就越有效率,政治制度的效率和政府权力与农民的福祉密切相关^[19],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政府资源的分配和制度安排两个方面。政府资源分配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涉及政府开支、转移支付、通货膨胀和就业状况等,这种分析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将农民的幸福置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大框架下,强调政府开支规模扩大和转移支付增加等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20]。制度安排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涉及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制度设计、参与政治活动的制度设计以及民主的整体运行质量状况等,这些民主制度安排与运行直接关乎农民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而对农民的幸福提升产生影响^[21]。然而,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制度安排都是政治系统提高自身公信力的措施,是政治系统获得民众信任和支持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反映了其对政治系统的信念

和信心。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政治信任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政治信任的调节作用。政党既来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有属性,政党以社会为基础,社会又依赖于政党实现自身的利益^[22]。政党与社会塑造之间具有耦合性,政党对社会进行改造,社会也反向地形塑政党,特别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党在形塑社会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更为明显^[23],因此在讨论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幸福感时政治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方面,或者说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是政治经济学揭示农民幸福感问题必备的两个核心因子。社会经济保障可以从物质条件方面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发展程度做出客观评价,而政治信任可以反映特定区域社会发展程度变化中的政治系统能动作用,这种作用在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幸福感的关系中则体现为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影响农民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对维护社会公平负有主要责任,而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之一,农民在生活层面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参与意愿,如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和需要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就会影响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高度信任的政治制度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前提。在农民整体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的情况下,农民幸福感增进问题不再是仅依靠社会经济保障就能够得以解决,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理论模型构建

农民的幸福是其对整体生活体验的一种持续和整体性满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评价,又因为不同农民个体在需求层次和认知能力及评价标准方面存在差异,这便造成不同农民个体对于幸福感的判断与评价又内在地与他们的认知水平、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关联,给农民的幸福定量研究造成了一定障碍。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看来,幸福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开放系

统,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对其进行分析评价。本文基于心理学已有关于幸福感评价的相关研究,从农民的生活满足、身心健康和自我发展能力等层次对农民幸福感展开评价与分析。

事实上,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有其自身特殊性,因此对我国转型期的农民幸福感问题进行研究时,必须要结合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因素对其进行一定的适应性修正和发展。国

家塑造社会的逻辑具有很好的政治民主性和较高的政治可行性优势,这两种优势归结为一点便是政治的可信度,这是利用西方一般社会学理论分析我国转型期的农民幸福感问题必须要考虑的方面,或者说我国转型期的农民幸福感问题研究需要同时考虑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两方面因素,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全面适用的农民幸福感理论研究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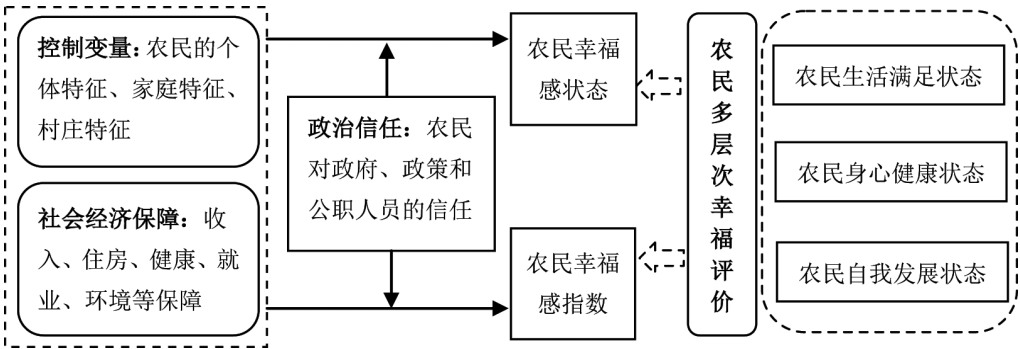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模型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20年2月至6月在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酒泉市金塔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固原市原州区的12个乡镇75个村庄的农民幸福感现状社会调查。为了使调查的样本更具代表性,本次社会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按照省(自治区)、县(市)、乡(镇)、村四级依次抽样,以村为抽样单位对农民开展入户访谈式抽样调查。在具体入户采访时,按照Kish表的方法抽取16周岁以上农民受访者进行采访,如果受访者的文化程度较高,采用自填问卷的方法,反之则由接受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采集数据。本次抽样调查共收回样本问卷1024份,有效问卷972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5%,抽样调查整体情况良好。

(二)变量说明

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和听取了专家建议后,借鉴已有关于农民生活满意和幸福感研究调查问卷,并根据本文研究对象的特性进行适当调整,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本文的调查问卷相关变量题项。问卷中除了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变量及识别

变量和控制变量外,其他变量测度指标均使用五级李克特(Likert)量表,同意程度均从1(强烈反对)到5(强烈同意)逐级增加。

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变量。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将幸福感看成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开放系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领域各方面的积极评价。本文从生活满足、身心健康和自我发展3个层次出发构建了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测度体系,具体在生活满足层次选取知足充裕、心态平衡和社会信心3个维度观测指标,在身心健康层次选取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家庭氛围3个维度观测指标,在自我发展层次选取成长进步、目标价值和自我接受3个维度观测指标。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本文按照多数指标满足原则识别农民样本是否处于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利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加权测度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用以反映农民的幸福程度。

社会经济保障。社会经济保障反映了农民通过环境或物质资源或农民的实际生活条件提高其社会参与程度,主要包括农民的收入、住房、卫生、就业和环境保护等。本文基于农民对各种社会经济保障的体验感知,从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健康保障、就业保障和环境保障等方面设置了社会经

济保障测量题项。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保障所有测度指标样本充足性检验 KMO 值为 0.632, Bartlett 球形近似卡方检验统计量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良好。

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系统运行的信念或信心,是民众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可信程度所采取的一种信任判断或政治评价^[24]。在相关实证研究中,测量民众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便成为一种获取政治信任变量的重要进路,按照该条路径本文从农民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 3 个方面设置了政治信任测量题项。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政治信任所有测度

指标样本充足性检验 KMO 值为 0.909, Bartlett 球形近似卡方检验统计量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也良好。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本文对几个可能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个人、家庭和村庄特征变量进行控制,并根据变量特性定义为连续变量或虚拟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拥有技能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情况、家庭耕地质量、家庭是否为贫困户、家庭是否为移民户等。村庄特征变量包括村庄的类型、村庄居住分散情况、村庄民族构成、村庄交通情况、村庄环境情况、村庄经济情况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民幸福感状态	农民处于不幸福感状态 = 0, 农民处于幸福感状态 = 1	0.784 9	0.411 2
	农民幸福程度	应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加权测度的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	0.692 3	0.219 3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经济保障	①农民的个人收入情况;②农民的家庭住房情况;③农民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④农民的日常工作情况;⑤农民的生活劳动环境情况	1.67E-07	0.104 2
	政治信任	①农民对政府信任程度;②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③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	3.97E-07	0.159 6
控制变量	性别	受访农民性别:女 = 0, 男 = 1	0.374 3	0.484 4
	年龄	受访农民当时年龄,单位:岁	42.495 9	10.644 7
	政治面貌	受访农民的政治面貌:群众 = 1, 民主党派 = 2, 中共党员 = 3	1.719 2	0.387 0
	受教育程度	受访农民受教育年限(不包括学前班、培训班),单位:年	6.742 2	4.258 2
	婚姻状况	受访农民当时婚姻情况:未 = 1, 已婚 = 2, 丧偶 = 3, 离婚或分居 = 4, 其他 = 5	2.052 5	0.538 5
	是否拥有技能	受访农民是否拥有从事其他非农工作的特殊技能:否 = 0, 是 = 1	0.239 7	0.427 3
	家庭劳动力情况	受访农民家庭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不存在 = 1, 偶尔存在 = 2, 一般 = 3, 经常存在 = 4, 始终存在 = 5	2.633 8	1.267 8
	家庭耕地质量	受访农民家庭的耕地质量情况:很差 = 1, 较差 = 2, 一般 = 3, 较好 = 4, 很好 = 5	3.124 8	0.841 5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受访农民家庭在扶贫攻坚时期是否为贫困户:否 = 0, 是 = 1	0.379 3	0.485 6
	家庭是否为移民户	受访农民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否 = 0, 是 = 1	0.141 2	0.348 5
	村庄类型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类型:普通村庄 = 1, 城镇驻地 = 2, 城郊结合地 = 3	1.200 3	0.489 3
	村庄居住分散情况	受访农民所居住村庄农户居住的分散程度:很分散 = 1, 较分散 = 2, 一般 = 3, 较集中 = 4, 很集中 = 5	3.243 0	1.097 2
	村庄民族构成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是否有少数民族居住:没有 = 0, 有 = 1	0.303 8	0.460 3
	村庄交通情况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是否通有公交车:没有 = 0, 有 = 1	0.315 3	0.465 0
	村庄环境情况	受访农民居住村庄周边是否有严重的污染源:没有 = 0, 有 = 1	0.093 6	0.291 5
	村庄经济情况	受访农民居住村庄同周边村庄相比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差 = 1, 较差 = 2, 平均水平 = 3, 较好 = 4, 非常好 = 5	3.029 6	0.785 8

(三) 实证模型构建

由于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包括幸福和不幸福两种情况,属于二元离散变量,而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属于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检验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影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估计法(OLS)检验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然后采用分位数回归方

法进一步分析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位数影响。

(1) Probit 模型。为了考察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影响,本文选用二元离散变量模型进行分析,并设定如下估计方程:

$$Prob(MHS_i = 1 | X_i, C_i) = \Phi(\alpha_0 + \beta_1 X_i + \beta_2 C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1)中, MHS_i 为虚拟变量, $MHS_i = 1$ 表示第 i 个农民样本处于幸福状态, $MHS_i = 0$ 表示第 i 个农民样本处于不幸福状态; X_i 表示第 i 个核心解释变量; C_i 为控制变量; ε_i 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代表不可观测因素的汇总, 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2) OLS 回归模型。为了考察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本文采用 OLS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本文具体设计的估计方程如下:

$$MHI_i = \alpha_0 + \beta_1 X_i + \sum \beta_{2n} C_{ni} + \varepsilon_i (n = 1, \dots, 16) \quad (2)$$

式(2)中, MHI_i 表示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 X_i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C_{ni} 为控制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β_1 至 β_{2n} 为参数, ε_i 为随机误差项, 满足相互独立、零均值、同方差的假设。鉴于 OLS 估计法只能得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均值, 而无法获得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分布规律的影响, 且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估计目标函数的 OLS 估计结果容易受极端值影响。为此, 本文在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 以残差绝对值加权平均为回归估计最小化目标函数, 克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得到条件分布全部信息。为了分析不同分位数上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本文建立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Quant_{\theta}(MHI_i | X_i) = \beta^{\theta} X_i \quad (3)$$

式(3)中, X_i 为式(2)中的自变量, β^{θ} 为系数向量, $Quant_{\theta}(MHI_i | X_i)$ 表示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在给定自变量 X 情况下与分位点 θ 对应的条件分位数。与 θ 对应的系数向量 β^{θ} 是通过最小化绝对离差(LAD)来实现的, 即:

$$\beta^{\theta} = \underset{\beta}{\operatorname{argmin}} \left\{ \sum_{i, MHI_i > X_i \beta} \theta |MHI_i - X_i \beta| + \sum_{i, MHI_i < X_i \beta} (1 - \theta) |MHI_i - X_i \beta| \right\} \quad (4)$$

在对分位回归系数 β^{θ} 进行估计时, 当前已有文献多数采用 bootstrap 密集算法技术, 也就是通过不断地进行有放回抽样获得样本的置信区间,

进而实现对回归系数的推断。

四、实证分析过程

本文使用 Stata 14.0 软件。首先, 检验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变量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关系; 其次, 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消除了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及异方差问题后, 在满足回归模型严格外生假设下, 应用 OLS 回归法分析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 进一步使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作用分布规律; 最后, 分析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交互项的影响作用。

(一)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检验

由表 2 中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社会经济保障作为社会组织系统为农民生活安全提供的保护屏障, 是农民通过环境或者物质资源提升社会参与的基础, 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 社会经济保障能力越强则农民越能够更好地在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时仍然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参与社会的机会, 在心理上农民可能会更多地处于一种幸福状态。由此, 从农民的幸福状态来说, 假说 H1 得到了证实。

由表 2 中的估计结果也可得知, 无论是使用 OLS 回归还是使用 bootstrap 方法的分位数回归, 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系数都是显著大于零的, 即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保障变量每提高个 1 个百分点时, 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 0.057 6 个百分点, 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与社会经济保障之间呈正向关系。表 2 中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保障变量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布规律, 可以发现社会经济保障在第 25、50 和 75 个分位点处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在影响效应分布规律上呈

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这说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提升的作用具有持续性,但边际效应会随着农民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而呈现出递减趋势。由此,从农民幸福感指数来说,假说 H1 得到了证实。

表 2 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OLS 回归	分位数回归		
	幸福感状态	幸福感指数	$\theta = 2.5$	$\theta = 5.0$	$\theta = 7.5$
常数项	-0.204 1 (0.717 2)	0.320 4 *** (0.102 5)	0.174 8 (0.203 2)	0.318 1 ** (0.139 3)	0.343 8 *** (0.125 7)
社会经济保障	0.237 6 *** (0.081 8)	0.057 6 *** (0.009 7)	0.060 6 *** (0.020 3)	0.094 7 *** (0.013 3)	0.056 7 *** (0.010 7)
性别	-0.097 3 (0.152 8)	-0.024 8 (0.018 9)	-0.033 8 (0.036 1)	-0.028 4 (0.025 8)	-0.030 8 (0.021 4)
年龄	0.003 7 (0.007 7)	0.001 8 * (0.001 0)	0.002 1 (0.001 7)	0.001 7 (0.001 3)	0.001 6 (0.001 2)
政治面貌	-0.058 8 (0.112 9)	0.033 8 ** (0.013 7)	0.008 0 (0.022 2)	0.053 9 *** (0.015 4)	0.041 3 ** (0.016 9)
受教育程度	0.022 0 (0.020 0)	0.005 9 ** (0.002 4)	0.006 9 (0.004 2)	0.006 9 * (0.003 6)	0.007 6 ** (0.003 2)
婚姻状况	-0.224 9 * (0.133 8)	-0.023 2 (0.017 4)	-0.023 5 (0.035 5)	-0.014 7 (0.024 7)	0.001 0 (0.027 8)
是否拥有技能	-0.176 8 (0.160 6)	-0.037 9 * (0.020 0)	-0.050 9 (0.035 7)	-0.047 1 * (0.027 4)	-0.040 5 (0.033 3)
家庭劳动力情况	0.086 3 (0.058 8)	0.004 6 (0.007 0)	-0.002 6 (0.011 1)	0.004 0 (0.009 0)	0.009 7 (0.008 6)
家庭耕地质量	0.059 1 (0.092 6)	0.030 9 *** (0.011 5)	0.039 8 * (0.024 1)	0.029 5 * (0.018 4)	0.043 1 *** (0.015 7)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0.135 6 (0.160 5)	-0.013 0 (0.020 0)	0.026 6 (0.039 8)	-0.055 2 ** (0.027 8)	-0.047 1 (0.032 3)
家庭是否为移民户	-0.547 7 *** (0.186 4)	-0.060 5 ** (0.025 7)	-0.142 7 *** (0.048 2)	-0.061 5 (0.057 5)	0.022 4 (0.040 4)
村庄类型	-0.528 6 *** (0.159 3)	-0.054 4 ** (0.021 3)	-0.033 8 (0.036 8)	-0.046 9 (0.029 8)	-0.077 3 ** (0.029 7)
村庄居住分散情况	0.073 0 (0.069 3)	-0.001 9 (0.008 4)	0.009 7 (0.013 4)	-0.007 5 (0.013 7)	-0.010 5 (0.012 1)
村庄民族构成	-0.050 4 (0.155 6)	-0.016 6 (0.020 2)	-0.017 8 (0.032 9)	-0.006 2 (0.024 2)	-0.036 7 (0.030 4)
村庄交通情况	0.353 4 ** (0.166 4)	0.014 0 (0.019 4)	-0.004 3 (0.032 6)	-0.009 3 (0.027 1)	-0.022 9 (0.028 5)
村庄环境情况	0.006 2 (0.234 7)	0.025 5 (0.032 4)	0.023 7 (0.050 4)	0.034 6 (0.048 2)	0.062 7 (0.050 5)
村庄经济情况	0.561 3 *** (0.104 4)	0.066 9 *** (0.013 1)	0.065 1 *** (0.004 2)	0.063 3 *** (0.024 2)	0.084 2 *** (0.025 3)
LR χ^2 检验	115.96 ***	—	—	—	—
调整的 R ²	—	0.287 9	—	—	—
F 检验值	—	12.35 ***	—	—	—
Pseudo R ²	—	—	0.174 1	0.221 8	0.178 3
样本量	972	972	972		

注:①分位数回归模型中的估计值是通过 bootstrap 方法迭代 400 次得到,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与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从表 2 中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个体特征层次的婚姻状况变量,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变量,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村庄交通情况、村庄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层次的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技能等变量,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耕地质量和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变量,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变量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有显著

影响效应。

(二)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检验

由表 3 中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政治信任因子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支持政府,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就越容易被遵循和执行,政治制度就会越有效,农民获得制度的公共资源和更公平的机会,在心理上农民可能会更加幸福。由此,从农民的幸福状态来说,假说 H2 得到了证实。

表 3 政治信任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OLS 回归	分位数回归		
	幸福感状态	幸福感指数	$\theta = 2.5$	$\theta = 5.0$	$\theta = 7.5$
常数项	-1.105 1 (0.827 6)	0.202 4 * (0.103 2)	0.033 5 (0.206 4)	0.014 1 (0.174 2)	0.346 4 *** (0.132 5)
政治信任	0.119 6 * (0.070 9)	0.018 7 ** (0.009 1)	0.017 5 * (0.012 9)	0.026 0 ** (0.013 2)	0.019 3 * (0.010 4)
性别	-0.055 5 (0.008 4)	-0.013 5 (0.019 4)	-0.011 6 (0.036 1)	-0.011 2 (0.026 8)	-0.025 6 (0.024 0)
年龄	0.005 3 (0.008 4)	0.001 3 (0.001 0)	0.001 2 (0.001 7)	0.001 6 (0.001 6)	0.001 3 (0.001 3)
政治面貌	0.019 9 (0.116 9)	0.045 9 *** (0.014 0)	0.044 9 ** (0.021 9)	0.092 1 *** (0.027 9)	0.040 5 ** (0.017 6)
受教育程度	0.023 3 (0.019 9)	0.006 3 * (0.002 5)	0.007 5 * (0.004 2)	0.009 9 ** (0.004 3)	0.005 8 * (0.003 5)
婚姻状况	-0.170 3 (0.133 5)	-0.014 7 (0.017 9)	-0.014 2 (0.034 4)	-0.016 3 (0.026 4)	0.008 5 (0.016 8)
是否拥有技能	-0.166 1 (0.160 9)	-0.032 8 (0.020 7)	-0.046 4 (0.035 1)	-0.023 2 (0.039 7)	-0.023 4 (0.032 4)
家庭劳动力情况	0.072 0 (0.058 0)	0.001 5 (0.007 1)	0.002 1 (0.011 7)	0.001 5 (0.011 3)	-0.002 3 (0.032 4)
家庭耕地质量	0.073 3 (0.092 6)	0.038 2 (0.011 8)	0.032 2 (0.023 8)	0.039 1 * (0.022 4)	0.049 0 *** (0.016 8)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0.084 8 (0.160 7)	-0.004 8 (0.020 6)	-0.017 2 (0.038 6)	0.013 5 (0.032 7)	-0.004 1 (0.028 6)
家庭是否为移民户	-0.547 9 *** (0.189 2)	-0.063 9 ** (0.026 8)	-0.127 9 *** (0.042 4)	-0.071 8 (0.064 6)	0.017 0 (0.047 5)
村庄类型	-0.397 9 ** (0.161 8)	-0.030 8 (0.021 9)	-0.013 5 (0.035 4)	-0.031 2 (0.036 3)	-0.046 4 (0.035 1)
村庄居住分散情况	0.067 1 (0.069 4)	-0.005 6 (0.008 7)	-0.003 9 (0.013 6)	-0.017 6 (0.016 2)	-0.016 9 (0.011 9)
村庄民族构成	-0.035 0 (0.159 2)	-0.026 0 (0.020 8)	-0.012 0 (0.035 0)	-0.009 0 (0.028 0)	-0.043 6 (0.028 9)
村庄交通情况	0.423 1 ** (0.167 3)	0.024 8 (0.019 9)	0.036 6 (0.030 5)	-0.012 6 (0.033 0)	-0.028 5 (0.030 6)
村庄环境情况	-0.046 5 (0.232 4)	-0.008 5 (0.033 2)	0.012 6 (0.053 3)	0.010 4 (0.055 3)	0.004 0 (0.062 5)
村庄经济情况	0.608 8 *** (0.102 4)	0.082 8 *** (0.013 1)	0.007 5 * (0.004 2)	0.111 8 *** (0.023 5)	0.094 3 *** (0.030 3)
LR χ^2 检验	111.77 ***	—	—	—	—
调整的 R ²	—	0.245 4	—	—	—
F 检验值	—	9.93 ***	—	—	—
Pseudo R ²	—	—	0.157 0	0.173 9	0.144 4
样本量	972	972	972		

注:①分位数回归模型中的估计值是通过 bootstrap 方法迭代 400 次得到,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与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 3 中的估计结果也可得知,无论是使用 OLS 回归还是使用 bootstrap 方法的分位数回归,政治信任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系数都是显著大于零的,即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

次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政治信任变量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 0.018 7 个百分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与政治信任变量之间呈正向关系。表 3 中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政治信任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反映了政治信任变量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布规律,可以发现政治信任在第 25、50 和 75 个分位点处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影响效应分布规律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这说明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提升的作用具有持续性,但边际效应会随着社会治理水平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而呈现出递减趋势。由此,从农民幸福感指数来说,假说 H2 得到了证实。

从表 3 中的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的影响,能够发现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变量,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村庄交通情况、村庄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层次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变量,村庄特征层次村庄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有显著影响效应。

(三)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分析

由表 4 中的结果可知,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除了受到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水平单方面因素影响外,也受到了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的交互项影响。从表 4 中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能够发现,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的交互项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也有显著影响。从表 4 中的 OLS 模型回归结果能够发现,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的交互项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也有显著影响。参考层级调节回归分析三步骤检验方法(HMR),本文对政治信任因子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即使用变量

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第一步,检验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第二步,将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变量同时引入回归模型,考察其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别影响;第三步,将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加入方程,检验这些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别影响。如果以上第一和第二两个步骤实证结果显著,并且第三个步骤的交互项系数显著,那么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成

表 4 交互项作用分析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OLS 回归		分位数回归		
	幸福感状态	幸福感指数	$\theta = 2.5$	$\theta = 5.0$	$\theta = 7.5$	
常数项	-0.607 9 (0.851 5)	0.330 0 (0.102 8)	0.171 6 (0.192 1)	0.323 9 ** (0.140 4)	0.373 2 *** (0.125 7)	
社会经济保障	0.209 8 ** (0.083 7)	0.055 9 *** (0.009 9)	0.055 3 *** (0.018 8)	0.095 3 *** (0.015 0)	0.049 7 *** (0.010 0)	
政治信任	0.073 3 * (0.036 1)	0.007 0 * (0.003 1)	0.008 6 * (0.003 4)	0.007 7 * (0.003 9)	0.008 5 * (0.004 1)	
交互项	0.034 5 * (0.016 5)	0.008 5 * (0.003 2)	0.005 1 * (0.001 8)	0.003 1 * (0.001 7)	0.004 7 * (0.002 3)	
性别	-0.090 7 (0.153 0)	-0.024 1 (0.018 9)	-0.025 9 (0.033 9)	-0.031 3 (0.027 4)	-0.040 2 * (0.021 2)	
年龄	0.006 6 (0.008 5)	0.001 7 * (0.001 0)	0.001 9 (0.001 5)	0.001 6 (0.001 2)	0.001 2 (0.001 2)	
政治面貌	-0.013 1 (0.118 5)	0.035 6 * (0.013 8)	0.013 0 (0.023 0)	0.053 7 *** (0.017 8)	0.049 2 *** (0.018 2)	
受教育程度	0.022 6 (0.020 2)	0.006 0 ** (0.002 4)	0.006 5 (0.004 1)	0.006 9 * (0.003 4)	0.007 2 ** (0.003 4)	
婚姻状况	-0.207 1 (0.135 3)	-0.022 7 (0.017 5)	-0.011 9 (0.036 5)	-0.015 4 (0.025 0)	0.007 5 (0.023 9)	
是否拥有技能	-0.167 5 (0.162 2)	-0.034 6 * (0.020 2)	-0.048 2 (0.036 7)	-0.046 2 (0.028 2)	-0.018 5 (0.030 5)	
家庭劳动力情况	0.090 5 (0.058 9)	0.004 9 (0.007 0)	-0.000 9 (0.010 8)	0.004 5 (0.009 5)	0.006 5 (0.007 8)	
家庭耕地质量	0.038 8 (0.094 1)	0.029 2 ** (0.011 6)	0.038 0 (0.023 9)	0.028 3 (0.018 0)	0.047 8 *** (0.013 7)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0.126 2 (0.162 2)	-0.014 3 (0.020 1)	0.003 3 (0.040 3)	-0.054 0 * (0.028 6)	-0.030 7 (0.025 7)	
家庭是否为移民户	-0.534 4 *** (0.189 4)	-0.062 2 ** (0.026 0)	-0.153 2 *** (0.043 4)	-0.064 8 (0.054 7)	-0.000 1 (0.036 3)	
村庄类型	-0.461 8 ** (0.168 6)	-0.049 6 ** (0.021 6)	-0.023 6 (0.035 8)	-0.046 0 (0.028 3)	-0.054 9 * (0.030 5)	
村庄居住分散情况	0.070 4 (0.070 5)	-0.003 8 (0.008 6)	0.002 9 (0.014 9)	-0.008 6 (0.015 4)	-0.008 9 (0.012 4)	
村庄民族构成	0.000 3 (0.160 3)	-0.014 7 (0.020 3)	-0.011 7 (0.036 5)	-0.003 3 (0.024 2)	-0.029 0 (0.026 6)	
村庄交通情况	0.389 3 ** (0.168 6)	0.015 1 (0.019 4)	0.014 3 (0.031 8)	-0.008 7 (0.025 0)	-0.018 4 (0.024 1)	
村庄环境情况	0.002 0 (0.235 3)	0.025 0 (0.032 5)	0.006 8 (0.036 5)	0.037 1 (0.052 5)	0.053 2 (0.047 5)	
村庄经济情况	0.534 5 *** (0.105 8)	0.064 5 *** (0.013 2)	0.064 2 ** (0.023 0)	0.064 6 ** (0.026 5)	0.059 7 (0.023 3)	
LR χ^2 检验	118.69 ***	—	—	—	—	
调整的 R ²	—	0.290 5	—	—	—	
F 检验值	—	11.14 ***	—	—	—	
Pseudo R ²	—	—	0.175 7	0.221 9	0.187 3	
样本量	972	972	972			

注:①分位数回归模型中的估计值是通过 bootstrap 方法迭代 400 次得到,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与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立。本文按照层级调节分析三步骤方法对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成立,即研究假设 H3 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由表4中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可知,社会经济保障变量在第50和75个分位点处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对本文的研究假设 H1 的检验证实进行了补充,通过比较社会经济对农民对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单方面分位数回归结果和加入政治信任和交互项的后的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分位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保障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政治信任变量在第25、50和75个分位点处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对本文的研究假设 H2 的检验证实进行了补充;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的交互项变量在第25、50和75个分位点处对本文的假说 H3 的检验证实进行了很好的补充。

五、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本文采用新的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变量进行替换。具体用受访农民样本对自身是否处于幸福状态的主观判断替代前文利用多层次识别方法获取的农民幸福感状态,在调查问卷中农民对自身是否处于幸福状态的调查问卷题目是“总体来说您觉得自己生活是否幸福”。用受访农民样本对自身幸福程度的主观判断替代前文从多层次视角出发加权计算获得的农民幸福感指数,在调查问卷中农民对自身幸福程度判断的调查问卷题目是“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自己当前的生活很幸福”,程度从1(强烈不同意)到7(强烈同意)逐级增加。在估计方法选取上,使用前文中的 Probit 模型估计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状态的影响,选取多值响应 Ologit 模型估计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程度的影响。具体估计是由3个模型完成的,模型(1)是检验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模型(2)是检验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模型(3)

是按照层级调节分析三步骤方法检验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幸福感影响的调节作用(见表5)。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Ologit 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数项	-2.001 9 ** (0.774 2)	-2.807 9 *** (0.754 9)	-1.970 6 ** (0.776 8)	—	—	—
社会经济保障	0.433 8 *** (0.076 4)	—	0.423 3 *** (0.078 9)	0.783 8 *** (0.101 1)	—	0.785 9 *** (0.102 8)
政治信任	—	0.147 2 ** (0.063 2)	0.087 7 * (0.046 5)	—	0.131 5 * (0.077 6)	0.011 4 * (0.005 2)
交互项	—	—	0.033 4 * (0.016 0)	—	—	0.080 2 ** (0.027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R χ^2 检验	110.32 ***	81.68 ***	112.17 ***	106.07 ***	44.52 ***	110.21 ***
P 值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伪) R ²	0.168 2	0.124 5	0.171 0	0.057 3	0.024 1	0.059 5
样本量	972	972	972	972	972	972

注:①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与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5中的回归结果能够发现,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影响依然是显著,且影响方向与表2中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政治信任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且影响方向与表3中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按照层级调节分析三步骤方法检验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影响的调节作用也是成立的。从表5中的回归结果还能够发现,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对农民幸福感程度的影响依然是显著,且影响方向与表2中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政治信任因子对农民幸福感程度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且影响方向与表3中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按照层级调节分析三步骤方法检验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幸福程度影响的调节作用也是成立的。这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可靠的,研究结论也是较为稳健的。

为了进一步更直观呈现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保障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在采用新的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变量进行替换后重新回归估计的基础上,借鉴 Aiken 等^[25]的操作方法,运用饱和回归方程简单斜率,将政治信任变量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带入回归方程,绘制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幸福感程度之间的调节效应图(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对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发挥

正向调节作用,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对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程度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政治信任可以增强农民对社会经济保障应对社会风险功能的认识,增加农民对社会经济保障制度提供的生命安全保障的信心,使农民在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同时,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增加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福祉的积极影响。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本文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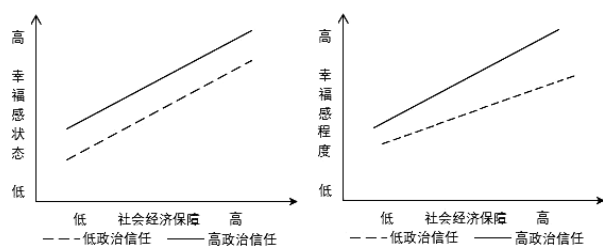


图2 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

六、简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 结论

第一,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密切相关,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均有正向影响效应。

第二,政治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农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水平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

第三,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农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水平正向调节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二) 政策启示

第一,尽管我国农村的普遍绝对性贫困问题得到了全面的解决,但农村所面临的相对性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因此在由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渡期,超越单一经济政策建立平等的发展机制,为农民创造公平的发展条件,使农民群体公平地享有社会发展成果将是应对相对贫困对农民幸福感提升带来挑战的宏观措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改善农民福祉奠定

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扎实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不再是一个愿景,而是要见成效的实质性进程,因此要立足农村资源禀赋优势,做大做强农村经济底盘的同时,也要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机制,赋予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夯实农民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基础。

第三,在农村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变得更为重要,完善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制度体系,提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强农村经济发展力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与养老条件,逐步拓宽农村社会经济保障范围和提升农村社会经济保障水平,将是农民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发力点。

第四,政治信任已是农村改革和基层治理过程中增进政府与民众互动、实现农村社会团结的重要因子,农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是确保社会经济保障政策顺利实施的前提,加强政府部门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履职能力,提升公共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普惠性,重塑公职人员的角色定位将成为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观后增进农民幸福感的重要着力点。

参考文献:

- [1] 罗必良,洪炜杰,耿鹏鹏,等. 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2021,37(10): 166-181,240,182.
- [2] 雷家骥,陈亮辉. 基于国民利益的国家经济安全及其评价[J]. 中国软科学,2012(12):17-32.
- [3] JUDGE T A, KAMMEYER-MUELLER J D. Happiness as a societal valu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1, 25(1):30-41.
- [4] RAHMAN A. Sources and categories of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service theory and practice, 2020, 31(1):1-33.
- [5] FLORIDA R, MELLANDER C, RENTFROW P J. The happiness of cities [J]. Regional studies, 2013, 47(4): 613-627.
- [6] 陈前恒,林海,郭沛. 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可及性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J]. 中国人口科学,2011(5):94-102,112.

- [7]刘同山. 农民合作社的幸福效应:基于 ESR 模型的计量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7(4):32-42.
- [8]许海平,张雨雪,傅国华. 绝对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 CGSS 的微观经验证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20,307(11):56-71.
- [9]乐君杰,叶晗. 农民信仰宗教是价值需求还是工具需求?——基于 CHIPs 数据的实证检验[J]. 管理世界,2012(11):67-76.
- [10]张彤进,万广华. 机会不平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2(5):94-108.
- [11]尤亮,杨金阳,霍学喜. 绝对收入、收入渴望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3):16-30.
- [12]BEN-ARIEH A. Beyond welfare: measuring and monitoring the state of children-new trends and domain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0, 52(3):235-257.
- [13]RAM 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large cross-country samples[J]. Public choice, 2009, 138(3/4):483-490.
- [14]李燕琼,吕维平. 我国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的住房安置状况及政策实施效果评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7(10):83-87.
- [15]BAI Chongen, WU Binzhen. Health insurance an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4, 42(2):450-469.
- [16]CLAIRE WALLACE.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984, 13(1):110-112.
- [17]武康平,童健,储成君. 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追求健康水平的消费动机出发[J]. 技术经济, 2015,34(6):95-105.
- [18]江维国,刘奕安,李立清.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价值目标体系研究[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5):91-96.
- [19]郎晓波. 从“政权建设”到“社会建设”:新中国 70 年城市基层社会的形塑与变迁[J]. 浙江社会科学,2019(6):75-82,157.
- [20]BAI C E, WU B. Health insurance an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4, 42(2):450-469.
- [21]YUQI L, FANGZHU Z, FULONG W, et al.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s in Guangzhou, China: the impacts of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J]. Cities, 2017(60):333-342.
- [22]胡象明. 政治信任风险视角下的政治安全逻辑[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74(4):140-148.
- [23]OTT J C. Government and happiness in 130 nations: Good governance fosters higher level and more equality of happiness [J]. Soc indic res, 2011, 102(1):3-22.
- [24]王韶兴.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年探索[J]. 中国社会科学,2017(7):4-28, 204.
- [25]AIKEN L S, WEST S G.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M].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1: 212.

(本文责编:辛 城)